

比较·反思·借鉴

——简评《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

叶世昌 欧阳文和

本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化”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所谓现代化,学术界在众说纷纭之后,大体上达成一个共识,即现代化是近代机器大工业兴起之后,先发型国家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后发型国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全球性革命大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属东方文明圈内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但在现代化进程中,两国却走上了迥异的道路,并导致不同的结果。对这一历史事实进行科学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严清华同志的新著《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一书,从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独到的研究。综观全书,我们认为在如下三个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合理的切入与逻辑拓展。现代化是一个包罗万象、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经济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和关键。经济现代化与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是密不可分的。事实上,现代化这一重大课题,首先就是由发展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发展和现代经济增长问题是现代化研究的中心课题。因此,作者从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的角度切入,比较研究中日现代化进程,就抓住了两国现代化的关键和主流;而且从经济思想史的层面展开研究,避免了文献的重复,研究的雷同,独辟蹊径。从所掌握的资料看,作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是富有开拓意义的,该书是国内唯一一部对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进行系统、全面比较的新著,填补了学术空白。

从逻辑上看,作者从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角度切入,有益于问题研究的深入。正如发展经济学家赫拉·明特所指出的:研究落后国家比研究发达国家更需要透过传统的社会表述的帷幕,深入到它的需要、活动、环境的相互适应的真正过程中去。作者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为线索,涉及到国民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有关活动、政策、制度,涉及到有关对策建议、主张、方案等制度层面和相关的技术、文化层面。这就有益于对中日现代化多层面的比较鉴别。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也就从哪里开始。作者严格遵循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统一的原则,首先描述了两国现代化的历程,接着详细考察了两国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的有关内容和范畴,在逻辑上构建了以重商主义思想为起点,以工业化思想为轴心,涉及两国经济发展目标构想、发展道路选择、发展速度理论,以及产业政策思想、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等诸多内容的两国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体系。因此,逻辑严密,环环相扣,层层深入是该书的特色之一。

二、同中求异的现代化进程研究。中日两国同属儒家文化圈,现代化发展的时间和机遇也比较近似,又都经历了重商主义、工业化的思想历程,为什么结果却大相径庭?作者立足于同,着眼于异,同中求异,为我们展示了中日两国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不同的历史轨迹。

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在现代化经济发展中,起点是有差异的。中国现代化起步之初,面临着现代化条件的先天不足与后天的极度欠缺。而日本则具有丰富的前现代化遗产并实际上已经开始萌动现代化,如近代工业的创办,西学的传入,早期重商主义与富国强兵思想的出现等。中国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处于数千年来一大剧变中,反映迟钝,因而愈发落后,中国对现代化的艰难探索,是一种典型的“回应型”。反应在思想上,中国近代思想的主流是救亡压倒发展,拿来主义盛行,经历了从最初的物质层面的师夷长技、商战、以

商立国,到后期重商主义的重工思想,到19世纪末康有为的定为工国主张和本世纪初张謇的棉铁主义、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在理论上都缺乏深度。而日本在前现代化遗产丰厚的基础上,反映迅速,通过明治维新搭上现代化快车,逐渐由“回应型”转向“自发型”现代化模式。在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上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就基本上进入了重商主义晚期,“五条国是誓文”和“殖产兴业”标志着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前田正名、福泽谕吉等人的工业化思想在理论上较中国思想家成熟而深刻。

在把握工业化时机的差距形成并拉大后,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现代化历程,在经济发展思想上也就迥然不同。在经济发展目标和道路的选择上,中国经历了由最初追求资本主义工业化到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转变,社会主义工业化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调整的过程;日本则从明治维新开始,其工业化目标与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就始终如一,避免了因目标指向和道路选择的变更而付出的高昂代价。在实现现代化的运行机制方面,中国从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的自由放任到计划干预思想,再到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导思想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艰辛曲折的探索过程;日本则始终注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认识上看,新中国使经济高速增长从可能变成现实,但在认识上又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改革开放后对增长速度仍在进行探索;日本下村治的高速增长理论从抽象到具体,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从两国产业发展政策思想上看,中国领导人有关产业思想的辩证认识多属创新理论型,即体现出较强的理论上的创新特色;日本产业发展思想则多属理论创新型,所注重的是理论的创新作用,更具实证性和操作性。

三、必然的推论与启示。通过作者同中求异的比较鉴别,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有益的启示。一是要充分认识政府干预与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历史给中日两国提供了两次相似的现代化发展机遇。一次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次是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第一次机遇来说,日本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在日本启动现代化之初最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时,这个政权应运而生了;而中国则是不幸的,因为在此关键时刻,独立统一的政权恰恰在此时衰落了。对于第二次机遇来说,日本必然地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结合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再度腾飞;中国必然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在经济建设方面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暴露了长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弊端,官僚主义、信息不对称与激励机制的欠缺造成了经济发展中的呆滞,说明体制改革乃势在必行。为此,要求我们既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又要注意体制改造,创造良好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条件。这是作者含蓄而深刻地总结出的一点启示。二是要注重文化变革与观念更新。作者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起步之初,之所以日本反应敏捷而中国却甚为迟缓,不仅是由于双方在起步之初的历史条件有异,而且还因为各自文化背景、社会意识上存在着差异。日本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显示出积极的吸收与包容精神;中国则背上沉重的“华夷秩序”包袱,经历了艰辛的文化、思想变革的阵痛,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对现代化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束缚力。因此,在我们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应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注意观念形态上的变革。具体而言,就是要把理论创新与创新理论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现代化经济发展观,包括正确的调控观、条件观、代价观、速度观、政策观等。这是作者总结的又一点宝贵的启示。

此外,该书还有史料丰富,论从史出的研究特色。作者在日本访学一年,书中的许多史料是作者的首译。有了丰富的史料,在研究上就能有的放矢,立论新颖而又论据充分。

当然,该书也有一定的不足。如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逻辑的把握似略欠火候;对中国现代经济思想(1919—1949)涉猎甚少,难免影响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的连贯性、整体性;还有个别论证也不无商榷的余地。但总的说,该书首次系统地介绍了日本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首次对中日两国现代化经济思想作出系统的比较研究,而且有较浓的时代气息。它以中日两国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为对象,详述其内容,比较其异同,分析其缘由,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和睿智的启迪,对于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作者:叶世昌,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欧阳文和,复旦大学经济系博士生,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 邹惠卿)